

# 回忆少奇同志在苏北时对宣教工作的关怀

戴 伯 韬

一九四一年初皖南事变后，我从重庆去新四军工作。历经种种关口，走了近四个月，才到达苏北盐城。那时少奇同志和陈毅同志受命于危难之际，几经战斗，才在江淮之间打开局面，建立中共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到了盐城，立即去西门外的泰山寺华中局报到。首先见到的是新四军参谋长赖传珠同志。他立刻介绍我到组织部曾山同志那里去报到，然后就把我带到胡服同志（当时少奇同志的代名）那里去，正好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同志也在。当他们知道我是从重庆来的，便亲切的问长问短，非常高兴。我先住进设在盐城城东的苏北文化协会内，不久就去军部，在华中局宣传部工作。从此，我就有机会经常和他们在一起，并且编在一个党支部过组织生活，和少奇同志朝夕相见，接触的机会很多。回忆起往事，感到少奇同志对干部的亲切教诲，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对党的事业忠贞不二，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 一、注意党风，培养干部

盐城是当时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干部大多是从四面八方来的。有些党员初来根据地，缺乏党的传统教育，经常听到一些小广播，损害党的团结。少奇同志看到这种情况，曾在华中党校作了关于纠正党内不良作风的报告。他指出：小广播容易泄露机密和损害同志之间的友爱，不利于党的团结，不利于对敌斗争，十

分有害。因此必须展开一次批评和自我批评，来清除资产阶级思想对我们党的腐蚀。他讲话既严肃又亲切。在泰山寺大门右边的偏殿内举行军部一次支部大会中，好多同志对不良作风都展开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当时陈毅同志也作了一次指名道姓的长篇发言，对党员进行了批评教育。小广播很快就停止了。

在反敌伪夏季扫荡时，发动群众在河内放置树木阻止敌船前进。反扫荡胜利之后，少奇同志要我到下面去锻炼，参加开辟盐阜地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工作。华中党校此时已迁到阜宁县的汪朱集，继续开课了。这时，少奇同志搬到党校住下来，而且经常上课。他在党校作了《党的建设》、《人的阶级性》、《人为什么会犯错误》、《组织纪律与修养》、《中国革命的战略与策略问题》、《论党内斗争》等报告。我们常从十几里以外的驻地叉头等村赶去听他的报告。华中党校盖了一个大草棚，大约可坐千把人。听报告的时候，早到的同志就坐在屋内，晚到的就在棚子外面听。我们有时候去的早，就围在少奇同志作报告的桌子旁边。他坐在方桌前，桌上放个热水瓶，一个茶缸。他一边抽着烟，一边演讲。讲得既生动、理论性又很强，做到理论结合当时斗争形势，把大家都吸引住了。往往一讲半天，讲者、听者都毫无倦容。听的人鸦雀无声，只能听到沙沙的笔记声。有时天冷了，屋外的人也在努力作笔记。时隔近四十年了，报告的内容已记不清楚，但对我印象最深的是《论党内斗争》。在这次报告中，他严肃地批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干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他指出：对党内犯错误的同志，不应该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应该用教育、帮助的办法。他说明了党内的思想斗争是需要的，但决不能像王明那样无情的去打击党内一大批干部。另外就是他的《人为什么会犯错误》的报告，给我的印象也很深。在这个报告中，他用唯物辩证的方法，讲人和动物的不同。人是要积极开展各种工作的，和动物消极被动不同。人的认识和客观不一致时，就难免犯这样那样的错误。犯了错误，吸取了教训，改了就行了。这次

讲话，对我启发教育很大。要求我们尽可能避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这两个报告，至今仍有指导意义，这是我们建党的基本原则。另外一个就是《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问题》，少奇同志从整个抗战的形势出发，论述了当时民族矛盾占主要地位，其他矛盾降到次要地位。因此，必须紧紧地抓住抗日斗争，牢牢掌握这面旗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参加抗日队伍。对于开明绅士，也要进行团结，不能排斥。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要有远见，始终要看到大局。他反复提到毛主席的话，说，如果我们党内有一、二百个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人，一个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听了他的报告，我们感到非常鼓舞，感到浑身有无穷无尽的力量，对工作倍加信心。

少奇同志在盐城时，又亲自组织华中局文教委员会，参加的有彭康、孙冶方、薛暮桥、钱俊瑞和我等人。研究如何在敌后展开党的宣传、教育工作。他一再对我们说，我们要建立自己的文化教育团体。指示我们：在教育方面，在文化方面，都可以组织自己的团体。在解放区，不比在国民党的统治区。过去，给人家抬轿子，现在我们要独立自主地开展文化教育工作，既可以办学校，也可以组织文化学术团体，把文化界、教育界的人士，都团结在党的周围，开展宣教工作。他驻在停翅港时，为了组织干部学习，亲自召集了一次学习小组会，选举了小组长，要我们学习军事和政治经济学。他选择和油印了一些学习资料发给我们。他每次都到会，每次都发言。有一次，我去的较早，就是我俩在他驻地的屋外学习。真可谓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教育、帮助干部的精神是值得我永远发扬的。

## 二、关心报纸，重视宣传工作

少奇同志非常关心当时的《江淮日报》。许多社论都是根据他的意见写的。每天早上报纸一到，工作再忙，他也要先看，发现问题，就立即解决。他对报纸一丝不苟，始终掌握着宣传党的方

针、政策，发动群众，打击敌人的大方向。当时，在报纸上，常有“鬼子”、“鬼子”之类的话。他当即指出：不能侮辱一个民族，我们打击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广大人民要争取，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写“鬼子”两字了。当他看到我们盐阜地区办的《盐阜报》之后，他高兴地说，这个报纸就是指导地方干部开展工作的，要认真办好。他对这样一张小报，也非常重视。记得我曾写过一篇关于政治与教育的关系，提出应该停止不符合抗日需要的课程，开展抗日教育的论文，登在这张小报上。他看后，表示赞成。可见，他虽然很忙，但对地方工作和报纸十分关心。对当时在新四军的外国记者，也经常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工作。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少奇、陈毅两同志曾找他们开了一次会，研究二次大战时希特勒会不会向苏联进攻？进攻后的形势如何？虚心地探讨了国内外形势的发展。

### 三、关心敌后教育，争取青少年

我们到苏北时，周围的城市被敌伪占领了，好多学校都从城市搬到农村。盐城县教育发达，公私立中学就有十几所。少奇同志要我们到这些学校去宣传民主抗日的重要性，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假抗日真投降的阴谋；宣传我党争取各党派团结进步，一致抗日的主张，反对顽固派倒退和投降的阴谋。宣传我们党的主张在学校里是会起积极作用的。因为当时师生中间有一种正统观念，认为只有国民党能抗日。国民党中，除汪精卫公开投降外，还有李精卫之流的人隐藏在抗日阵线里，破坏抗日，企图投降。把这个真相告诉师生，就可以把他们团结在党的周围，一致抗日。我们到过很多学校，其中包括设在宋村的宋泽夫老先生办的中学。

一九四一年春天，他指示宣传部部长彭康同志，要召集一次新四军地区教育工作会议，并发出通知，规定了会议内容和大会开会的时间，要我们做好调查研究和其他准备工作。但因为敌伪向我地区发动夏季攻势，苏北抗日根据地被敌伪切成许多小块，交通

很不方便，我们也忙于抗日战争，会议未能召开。

我到新四军第三师地区以后，有一天，有一个同志找到陈家集子乡公所去。我去一看，少奇同志正在那里。当时有刘彬和宋乃德等同志在座。少奇同志对我们说：你们要建立盐阜区抗日民主根据地，要成立政府。他说：这个地区，知识分子很多，青少年也很多，但学校已经星散。为了避免这些人流到敌伪地区去，或者流落到荡西磨擦专家韩德勤那里去，或者向大后方跑，我们应该开办学校，团结他们，使得他们有书可读，有地方可教书。首先希望你们办一所联合中学，要从初中一直办到高中，然后在每个县里办一所初中。教育这些青少年很重要，我们现在和将来都要依靠青少年。要巩固根据地，开辟根据地，要依靠他们；要看到他们有抗日的进步一面，他们是勇于接受真理的。你们没有人，军部可以调一些给你们，但主要是团结地方知识分子。对他们的待遇要提高一些，使他们可以赡养家属。我们拿供给制，刻苦一点为好。根据少奇同志的意见，我们很快就办起联中和盐阜师范学校，由本地江重言同志任联中校长。

早在盐城城内时，就办了抗大五分校和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少奇同志非常关心这些学校。我曾参加过少奇同志、陈毅同志分别召集的鲁迅艺术学院的教师座谈会，讨论学校的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等问题。当一九四一年六月，敌伪夏季攻势向我根据地进攻时，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在朦胧以东地方即现在的建湖县庆丰公社北秦庄一带被日伪军包围。当时学校的教导主任丘东平同志站在坟墩上指挥师生和敌人作战，不幸与不少师生一起牺牲了。同一天，新安旅行团的负责人张平、张杰两同志为了找少奇同志谈工作，在北秦庄路上也被敌人杀害了。当少奇同志在周门军部所在地召集鲁迅艺术学院师生开会时，向到会的师生表示了亲切的慰问，鼓舞他们不要因有同志牺牲而丧气，要鼓足干劲，充满信心的干下去。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他的讲话，使在场的我也受到鼓舞和教育。

一九四一年冬季，我陪着新安旅行团的顾问汪达之同志去找刘少奇同志的时候，他对新安旅行团的小同志非常关心，对达之同志说：你们在国民党地区受迫害、限制，到我们抗日根据地，应该充分发挥力量，扩大组织，小孩子是不可忽视的抗日力量。我们各地都有儿童团，你们应该对儿童加强组织工作，进行帮助和教育嘛。

一九四二年一月至三月，少奇同志准备离开苏北。他在单家港亲自召开了一次华中局扩大干部会议。会议是在一个临时搭起的大草棚内开的。依师部所辖地区划分小组讨论。当时除了五师外，其他地区的党政军负责干部都参加了会议。少奇同志在这次会议上作了一次《目前形势，我党我军在华中三年工作中的基本总结及今后任务》的重要报告，对华中党和新四军从抗战以来作了全面的总结，并布置了今后的任务。各地区的党政军领导干部都在会上作了汇报。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二师师长罗炳辉同志的报告。他身体魁梧，讲话累得头上直冒汗。说的实实在在，讲的全是他亲身经历的事，很生动。虽然距今近四十年，此景此情犹历历如在目前。在那次会议期间，少奇同志一再催我去参加会议，他在会上要布置敌后教育工作，希望我去参加起草有关教育的文件。可见他在临走前，还念念不忘敌后的教育工作。一九四八年，我在山东时，他电告华东局，要我们赶快去西柏坡编中小学教材，以适应广大解放区的需要。在一九四九年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上，我们见面时，还谈起这件事。

总之，少奇同志在苏北新四军地区不过两年多，他在军事、政治上打击了敌人，扩大和巩固了根据地，团结了广大群众。他特别关心教育干部和培养青少年，一再强调要团结敌后的广大知识分子，开展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工作。为了巩固、扩大根据地，加紧消灭敌人，解放全民族，少奇同志在华中地区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至今苏皖等地人民犹十分怀念他。

一九八〇年五月廿二日